



王栋：抗战一线的战斗英雄



王栋。(资料图片)

王栋，原名王澄宇，又名王撑宇，1914年生于宁夏中宁县鸣沙镇薛营村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家庭。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王栋自幼熟读私塾，1933年由中宁县恩和高小毕业，通过对进步书刊的阅读，开始了解并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1934年夏，王栋的父亲到天津经商，20岁的王栋随父亲到北平上学。在北平，由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、表兄张子华介绍考入北平文治中学。在此期间，张子华利用工作之余，常来和他攀谈，又介绍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。王栋从平时与张子华的谈话和书刊中，了解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些情况，对旧中国的黑暗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逐渐有了认识，开始向往革命并对共产党产生了敬

仰之情。同年9月的一天，张子华突然匆忙地来到王栋处，对他说：“表弟，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有公事要去河南。今后，诸事都要小心，谨言慎行，多加珍重！”说罢转身就离开了。几天后，国民党特务就突击搜查了张子华住处。一天，公寓忽然闯进两个特务，将正在吃午饭的王栋抓到北平市第五区公安局，向他逼问张子华的去向。王栋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便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无论特务对他采用什么手段逼问，王栋始终回答自己不知道，特务没有得到任何信息，最终将王栋关押了七八天后释放。

1936年5月，王栋的父亲从宁夏到天津，写信叫王栋去天津相见。王栋便请假来到天津，两人见面后，其父认为当时平津地区社会秩序混乱，日本浪人满街横行，坦克呼啸街市，在北平上学太危险，遂让他停学回家。出于对革命的向往，王栋不愿中途辍学，经过再三要求，又返回北平，在其友袁家节家补习英文和代数。

1937年春，王栋转入北平铁路学院附属东方中学上高中。当时，平津市民抗日情绪高涨。5月，北平高中学生齐集西苑进行军事训练，后因七七事变发生，平津沦陷，王栋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，流亡到青岛。经过流亡同学会的帮助，经徐州、郑州，来到西安。到西安后，王栋立即四处打听张子华的消息，最后从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张子华已被调回延安，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。王栋立即给张子华写了一封长信，表达了希望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和工

作的愿望，请八路军办事处给予转达。在等待张子华复信期间，王栋因长时间离家，十分思念母亲，于1937年年底回到家乡中宁。回家后不久，便收到了张子华的复信，信中表示欢迎王栋前往延安。王栋欣喜若狂，立即向父母和妻子辞行，于1938年4月，邀约好友一起踏上奔赴延安的征程。到延安后，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西洛川，被编入设在那里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学习，化名雷鸣。同年10月，调延安抗大五大队政工队学习。12月由周玉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9年4月学习结束，组织上原拟分配王栋到陕北一个县当县政府秘书，但他却强烈要求上前线。同年6月，王栋被分配到内蒙古大青山骑兵支队工作。在此期间，王栋先后任三团侦察员、一连副连长、游击队长、十一连代理连长、政治指导员等职务。他善于团结同志，吃苦耐劳，作战勇敢，经受了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。1943年1月，王栋被调到山西偏关抗大七分分校参加整风。1945年4月，整风结束后，王栋被分配到晋绥军区一纵队三五八旅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，1946年任营长，后又升任副团长，转战陕北，参加了保卫延安、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。

1947年10月，在清涧战役中，王栋不避艰险，身先士卒，深入前沿阵地，不幸牺牲，时年33岁。

1952年1月15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追认王栋为革命烈士。

(据宁夏党史教育)

陕甘宁边区情系群众抓防疫

1936年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去陕甘宁边区采访之前，在身上注射了“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”。他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、伤寒、霍乱、斑疹伤寒和鼠疫等病菌。这5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。”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真的如他所说瘟疫蔓延吗？又是如何防疫的呢？据查阅当年的《新中华报》和《解放日报》的相关报道，陕甘宁边区尽管医疗技术落后，药品物资匮乏，但是边区政府立足民众，情系人民，克服困难，扎扎实实地抓好传染病防疫工作，卓有成效。

创办保健药社 解决群众就医难

党中央进驻延安时，延安仅有六七家中医药铺和少量坐堂医生，全边区也仅有医生1200多人。1938年，边区民政厅委托长期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李常春筹备创办集制药、售卖、医疗三位一体的股份制卫生医疗合作机构——保健药社。1939年7月，陕甘宁边区第一家保健药社在安塞县冯家

塬成立。

为取得边区群众的信任，改变他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不良生活习惯，保健药社提出了“免费吃药，管保治好”的口号。李常春医术高明，且服务热情周到，经常带领大家上山采药，下村治病。他们对灾民、抗属看病免费，药价优惠折扣，贫困户也予照顾。

边区农村医疗机构和卫生所稀少，群众要跑很远的路到城镇看病，有时得了急病来不及看就死了。1944年4月，延安市总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，部署各区成立医疗合作社。市政府拨给每个区4万元，采取公助民办的形式发展乡村卫生服务，以便利群众就近防疫看病。

毛泽东为医院更名

1939年4月，中共中央根据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的建议，筹集了5000元专款，在延安城北约5公里的李家洼村兴建医院。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在山下的平地上盖起了一些平房，在山坡上挖了两排、约40间窑洞，摆放了30张自制的简易病床，9月开始接收病员，边看病边建设。

一开始医院的名称准备叫“中央干部医院”，毛泽东知道后说：“叫‘干部医院’，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？我看还是叫‘中央医院’好，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，为群众服务。”

1944年4月30日《解放日报》发表傅连璋撰写的《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些初步材料》说：“如去年

一年中央医院，免费收治了163名老百姓病人……中央医院过去每月最多收治老百姓22人，到3月就收治了49人。”延安的其他医院也把为群众治病防疫当作己任，“清凉山卫生所1月份为群众诊疗共72人；2月就增加到228人，3月增加到366人，4月13天内看了249人。”

防控突发传染疫情

1944年初，延安各区突发疫病。从1月到5月初，疫情导致死亡人数超过500人。边区政府于同年5月10日召开由专署、市政府、延安县、中央卫生处、留守兵团卫生部、边区卫生处、和平医院、中央医院等有关医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，以组织领导防疫工作，紧急动员起来，

集中人力、物力，立即投入扑灭疫病的战斗。

据1944年6月3日的《解放日报》报道，各防疫医疗队面对如此严重形势，查清病原，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办法，号召群众不吃生水、死猪肉，酸菜必须大量加盐或炒熟再吃。医疗队成员还动手为群众打扫卫生、修建水

井。为了及时挽救病人，他们不辞风雨，连夜翻山越岭去看病。20多天以来，医疗队员们身担干粮药品，走遍大小数百个村庄，无论在疫病治疗、卫生宣传和疾病统计上均收效甚大。至5月底，延安一带“吐黄水症”已大致停滞。

(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)

讲文明 树新风

倡导厚养俭葬 践行文明祭扫

